

仁波切进内地

身穿藏袍的母亲望着镜头，眼神安静祥和，怀抱中被襁褓包裹的孩子，懵懂地看着外面的世界。

6月18日，藏区摄影师沈云遥将在藏区拍摄的照片打印出来。从2011年开始，他每年都会在藏区呆八个月做志愿者，在他眼中，那里是很纯净的地方，有着喧嚣城市没有的质朴。

当听说沈云遥要去寺庙，陌生的老阿妈塞给他10块钱，请他帮忙转交给寺庙的喇嘛。这让沈云遥心里突然洋溢起感动，在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日渐稀薄的时候，那里的寺庙里，依然有藏区人民信任的宗教领袖、心灵导师，或者藏区医生。而他们有个共同的称呼——仁波切。

在相距3000多公里的北京城，“仁波切”却正在舆论漩涡中。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在朝阳区辽阔的大地上，生活着数以千计的仁波切，其中约80%说话带东北口音，且长相有浓厚的《乡村爱情》演员海选第二轮被刷掉的感觉，约90%从来没有完整地看过任何一本佛经，而且对与任何佛学相关的问题都会回答“这是秘法不可说”，大约100%只有在听到供养和双修的时候会精神振作。

这跟沈云遥了解到的大不一样。沈云遥告诉记者，“仁波切”是一个尊称，所有的活佛都可以被尊称为“仁波切”。而听起来“高大上”的“活佛”，并不是想当然的“活着的佛”，而是“转世修行者”。当高僧圆寂，人们会根据他生前的暗示，遗嘱到各地寻访灵童，灵童再经过选拔、经院培养等一系列程序，方可成为转世活佛，从而被尊称为“仁波切”。

在沈云遥的印象里，藏区活佛并不多见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官方承认的活佛接近2000人。但现实是拥有活佛头衔的人远不止于此。他们出现在微博上、朋友圈里、畅销书中、朝阳区的聚会里，而不仅仅在藏区的寺庙里，这让沈云遥以及其他在藏地生活的人很难理解。

其实，由于历史原因，现实中的活佛有多种来历，官方认定只是其中一种。上世纪80年代恢复活佛转世后，到2007年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》出台之前，由于活佛转世管理还没有上升到制度层面，出现了一个寻访、认定活佛的高潮。大量已经中断转世传统的中小寺庙，又纷纷恢复了转世，一个佛位出现两个或多个转世灵童。除了高僧和寺庙认定，甚至还出现了个别人以转世“活佛”身份自居。

与活佛大量涌现相对应的，是在90年代初，内地出现了供养藏传活佛的热潮，大量藏区活佛涌入内地，传播佛法。当沈云遥看到书店畅销区出现了“仁波切”的名字时，才知道“仁波切”已经不仅仅是藏区宗教领袖的意思。

明星、富商

最先拥抱仁波切

沈云遥还记得第一次在藏区见到仁波切的情景：安静的寺庙里，他非常淡然地坐在那儿。当有人与他交谈时，他平平淡淡，从容冷静，无论聊的事情好与坏。

每次跟仁波切聊天，沈云遥都有不同的体会。初入社会买不起房子，女友离开了沈云遥，这让他十分痛苦。一位藏区寺庙的仁波切对他说，一切随缘，不要强求，既然她要

仁波切：富人的“鸡汤”



竹庆本乐仁波切，台湾艺人阿雅的老公。(资料片)

您有没有觉得，朋友圈里，“仁波切”已经大批量生产了？他们熬制的“心灵鸡汤”越来越多了？看着仁波切与女明星结婚生子的新闻，你是不是感慨自己三观尽毁了？

仁波切原本是藏族信教群众对活佛的敬称，被尊称为仁波切的活佛分为在家和出家，在家人可以娶妻生子，不必拘束于寺庙。但当他们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间、网络上，熬制出大碗小碗的“鸡汤”时，“仁波切”也就诞生了新的意义。

有人笑谈，“北京朝阳区有三十万散养仁波切”。其实，有需要就会有市场，这个意义上的“仁波切”与文化人、艺术家并无太多不同，只是可能要比电影导演、小说作家更高端。

本报记者 陈玮

离开，就是注定她不属于你，你应该放下这些来面对生活，这让沈云遥很受用。

渐渐的，沈云遥改变了对生活的态度。“仁波切让我很坦然，从容地面对生活与工作中发生的一切，理智地分析和解决问题，更好更透彻地去看社会中的美好与丑恶。”

而沈云遥并不是一个人。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，港台一批明星和富商率先兴起了供养藏传佛教的热潮。信佛的明星一般都拜有上师，有人信法王，有人信白龙王，有人信仁波切。刘德华、齐秦、梅艳芳、林青霞等巨星都笃信佛教。

王菲是虔诚的佛教徒，她从1992年开始信佛，为信仰出钱出力，闲时遍访名山大川的大德高僧，还经常跑去西藏叩头，或者飞去印度拜访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学习修行。曾志伟笃信佛教已有11年，他当年决定信佛就是因为艺人最难面对的便是由高峰跌下的压力，佛教常说无常，今日拥有的东西，明日可能全部失去，他觉得艺人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。而台湾艺人阿雅、香港女歌手关淑怡等甚至还为仁波切生了孩子。

后来，这种心灵慰藉逐渐在更大的精英群中蔓延。在北京朝阳区从事传媒行业的白领刘天(化名)说，在中产以上的阶层以及文艺圈中，即便没有供养、信仰过“仁波切”，每个人也都或多或少了解或见过他们。著名主持人窦文涛则说，每个富人身后都有一个仁波切，充当着心灵医生的角色。

“地位越高，阶层越高的人越信仰仁波切。”长期生活在北京的社会学家艾君说，“这是精英阶层的特点导致的。当衣食无忧之后，他们还追求什么呢？自然是求个平安，追求心灵上的满足和宽慰。”

在经济高速发展中，社会精英群体虽然在物质财富与社会地位方面获利最大，但是他们的压力感与危机感也很明显。比如，影星佟大为曾坦言：“有一段时间也感到内心迷茫。成名得太快了，有时候仿佛措手不及。纷杂的生活让我开始茫然，如何对待功名利禄，成了我当时最需要解决的心灵和思想问题。”

而这时，使人平和安定的佛教，就成为了解药。在一个专门对企业家群体做的调查中，当被问及宗教信仰人数上升的原因是什么时，有77.2%的人认为是“寻找精神寄托”。

“仁波切”是社交手段也是人脉

当“仁波切”走进精英圈，意义又有了新的变化。

熟悉文艺圈的刘天看来，圈里的人想要成功，人脉是不可或缺的因素。“师兄师妹的称呼在圈里特别流行，谁都在费尽心思地搭上有用的关系。”于是很多人都瞄上了“仁波切”。

据公开报道，一位女演员在李连杰拍摄的电影《海洋天堂》试镜时，因为“悟道”的共同话题，她很快与当时的副导演熟络起来，自然而然，她最终得到了想要的角色。

渐渐地，“仁波切”走上了精英们暗自较劲的饭桌上，“在饭桌上，当聊起某件困惑的事情时，常会有人说起，‘我拜了一个大师，哪天给你点拨一下。’或者约定，在下次聚会的时候，请来一个。”艾君说。

刘天说在竞争激烈的北京城，在暗流汹涌的社交场所，有些人最怕的就是别人瞧不上自己。“于是大家疯狂恶补着仁波切，为的是不被这个圈子排挤出来。”圈里的同行感慨：在一定程度上，“仁波切”就是一种社交手段。

“这是一种普遍现象，是一种虚荣。”艾君说。在房子、金钱、车成为精英层的“标配”之后，他们需要一个“高配”，需要身份标签，以此区别开芸芸大众。而能够亲近上师本身就是文化品格与阶级地位优越的表征，簇拥在上师身后的善男信女没一个穷人。

即使没有“仁波切”，也会有别的东西出现。就相当于考试前去拜神，为有个好的人生去求名字，遇到了难题求助于村里的半仙，只不过“仁波切”更加高级，更符合精英圈的身份。

“只是，宗教可以作为心灵的寄托，而不能作为改变命运的工具。”艾君说。

今年，沈云遥并不打算去西藏，尽管他很向往那个纯净的地方和仁波切的教导，但是他想留下更多的时间踏实工作，赚钱在上海买个房子。至今，他还会经常跟藏区的仁波切在微信上聊聊天，谈谈西藏的发展。仁波切也会托沈云遥买部iphone6寄过去，因为他们也想脱离原始的生活。他看到，对于更多出现在公众之间，仁波切内部也有意见分歧，在很多藏区仁波切眼中，那会打扰安静的修行。

是啊，世事本就是互相影响的，你又怎能保证抚慰人心的“仁波切”不会被复杂微妙的人心改造？怎样能保证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不会让他沾染上更多的色调？

秦咏诚：
人归来处，曲不终天

“锦绣河山美如画，祖国建设跨骏马。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，头戴铝盔走天涯。”时至今日，这首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依然在60后、70后之间传唱，但是，它的作曲者却离开了。6月25日，作曲家秦咏诚在北京病逝，享年82岁。

秦咏诚出生于1933年，少年时期受到父亲秦枫的影响，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秦咏诚笔下，每首歌曲都风格明快，朗朗上口，充满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热爱，以及浓厚的时代气息。无论是声乐协奏曲《海燕》中的海燕形象，小提琴独奏曲《海滨音诗》中的海滨意境，还是歌曲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和电影《创业》中的石油工人形象等，我们总会感受到他充沛的感情积淀和准确的形象思维。

秦咏诚音乐生涯中的代表作品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只用了20分钟就完成了。1964年，秦咏诚到大庆油田体验生活，在寒冬腊月、滴水成冰的“北大荒”，秦咏诚与“铁人”王进喜共同生活了数天，深受感动。当拿到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这首诗时，他立刻涌起了强烈的创作冲动。他马上赶到队里食堂，仅用了20分钟就谱完了曲子，一直传唱至今。

除了《我为祖国献石油》，秦咏诚还创作了多首歌颂祖国的歌曲。比如《我和我的祖国》、《毛主席走过祖国大地》、《欢笑吧，我的祖国》、《祖国之爱》等。沈阳音乐学院音乐系教授高虹曾说，秦咏诚创作的宗旨就是为祖国、为人民。“这不是唱高调，这是老人的真实想法。他笔下的每首歌都贴近百姓，朗朗上口，他喜欢大海、喜欢石油工人，一生创作了大量歌颂石油工人的作品。”退休后的秦咏诚并没有归隐山林，“他在全国各地当评委、做讲座，也经常回沈阳看看。”

临终前，秦咏诚还创作了歌曲《我们赶上了好时代》，然而却已成为绝唱。但人归来处，曲不终天，他的歌曲带着他对祖国的深厚情感，将永远流传。



本报记者 陈玮